

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 ——基于专项转移支付分项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朱 光¹, 李 平¹, 姜永华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42)

摘要:文章以教育、医疗、社保、环保与交通运输五大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为研究对象,阐释了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对这五大领域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作用,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专项转移支付对上述五大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对环保与交通运输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科学确定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结构,可以有效地矫正地方财政支出扭曲,从而有助于促进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关键词: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地方公共支出;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2.7;F810.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 (2019) 03-0145-07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s,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s —Based on the SDM Analysis of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 Sub-items

ZHU Guang¹, LI Ping¹, JIANG Yong-hua²

(1.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China Academy of Finan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4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five major categories of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s in education, medical care, social secur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ains the impacts of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s and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s on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s in these five fields. The paper builds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o analyze quantitativel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s in the above five areas, whereas the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s onl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s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Therefore, the structure of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s and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s should be determined scientifically, which can effectively correct distortions in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 expenditures.

Keywords: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s;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s;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s; Spatial Durbin Model

一、引言

我国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较大,而在公共服务的差距背后,则是地区间财力和公共支出的差距^[1-2]。为了缩小这一差距,我国自1994年开始逐步建立完善转移支付体系,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财政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规模上看,2017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总额分别达到3.51万亿元和2.07万亿元;从比重上看,2017年这两类转移支付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87.7%,占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60.1%。鉴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重要性,研究这两类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对于促进转移支付结构合理化以及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事实上,学界已对这两类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统一看法。对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一方观点认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区间的财力差异,从而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3-5]。但另一方观点认为,在“晋升锦标赛”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制定预算时

收稿日期: 2018-11-2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1373031)

作者简介: 朱 光(1988-),男,安徽合肥人,博士后,研究方向:财政学,技术经济学;

李 平(1959-),男,河北保定人,研究员,硕士,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

姜永华(1946-),女,山东荣成人,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财政学。

可能会对某些公共服务领域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对这些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胡德仁、刘亮(2008)及姜永华等(2008,2014)用数据证明,现有转移支付制度横向均等化效应不明显,没有起到缩小地区差距的应有作用^[6-8]。对于专项转移支付,一方观点认为专项转移支付在分配和使用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 McGuire(1979)提出了专项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内部挪用到其他项目的“可调换假说”^[9];Islam(1998)等也证明美国、加拿大在市政服务、高速公路建设和社会服务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中有不等的挪用比重^[10];董再平(2013)等认为专项资金存在不配套、少配套、截留挪用等问题^[11]。另一方观点则认为专项转移支付具有较为积极的效果,例如李丽琴(2012)等通过城市生活保障数据的研究得到专项转移支付存在的合理性^[12];赵海利(2014)通过某省专项转移支付数据分析了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受益群体的影响^[13];马光荣、郭庆旺(2016)等通过定量分析得出,专项转移支付可以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4]。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目前关于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研究主要关注现有转移支付能否有效率地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以及对转移支付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对于转移支付影响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影响则研究较少,使用两类转移支付分项数据对各领域地方公共支出分别进行分析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考虑转移支付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对于地方公共支出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影响进行分领域研究和比较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拟依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数据资源,基于2011-2016年全国省级专项转移支付分项面板数据,选取相应控制变量,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根据数据的空间相关性采用相应的空间计量方法,分领域定量评估和探讨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

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机理

不同种类的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具有不同的影响机理。我国的转移支付分为四类: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老体制补助^[15]。后两种金额较少且分配比例固定。表1是2011-2016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金额、占转移支付总额比重以及省际转移支付金额最大值与最小值倍数。从表1可见,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2016年已经达到99%;两类转移支付分配的差异也较大,专项转移支付的省际差距约为10倍,一般性转移支付更是达到40倍左右。

因此本文聚焦于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分省研究,而不考虑税收返还和老体制补助。

表1 两类转移支付对比

年份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金额 (亿元)	占整体 比重(%)	省际差异 倍数	金额 (亿元)	占整体 比重(%)	省际差异 倍数
2011	18 300	50	39.38	16 522	45	7.53
2012	21 430	51	40.42	18 804	44	9.56
2013	24 363	54	40.07	18 610	41	11
2014	26 566	58	40.07	18 936	42	11.68
2015	28 455	54	47.54	21 624	41	9.45
2016	31 865	60	41.84	20 709	39	10.45

注:计算省级差异倍数时将计划单列市与其所在省份作为整体考虑;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预算司网站。

其中,专项转移支付又称有条件补助或专项拨款,是下级政府因承担上级政府委托事务或政府间共同事务而享受的上级政府补助资金。我国专项转移支付的使用主要采用中央补助、地方配套这一国际通行的方法,根据具体情况地方配套金额占比从10%到80%不等,因此专项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资金的倍增器作用^[15]。专项转移支付能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取决于专项的设置与拨款力度,其次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配套和使用。

从专项转移支付的设置角度分析,2017年在我国专项转移支付的构成中,和公共服务直接相关的专项占47.7%,其余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农林水等民生项目占39.2%。在中央政府拨付的专项转移支付中,包含大量作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项目,因此能够促进地方财力投入这些领域,从而起到促进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Besfamille(2003)的研究表明,美国等国家出于平衡地方公共服务支出的考虑,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更强调地方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和交通等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16]。尹振东(2016)等的研究也认为^[17],专项转移支付具有一般性转移支付所不具有的功能,如果设计良好,专项转移支付则能够较好地起到矫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作用。

从地方政府对专项资金的配套和使用角度来说,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比例、分配方式可能不符合地方政府偏好,因此可能会出现挪用现象。例如 McGuire(1979)提出了专项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内部挪用到其他项目的“可调换假说”^[5];Islam(1998)等也证明美国、加拿大在市政服务、高速公路建设和社会服务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中有不等的挪用比重。但是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在使用中必须明确政策目标、部门职责分工、资金用途、补助对象、分配方法、资金申报条件、资金申报、审批和下达程序、实施期限、绩效管理、监督检查等内容(见《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因此不容易被挪作他用。近期的国内实证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我国的专项转移支付总体达到了预期效果,例如李丽琴(2012)通过城市生活保障数据的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专项转移支付支出总额的增长,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覆盖面及保障水平上都有了较大增长^[12];赵海利(2014)通过某省专项转移支付数据分析了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对于受益群体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为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受益者^[13]。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专项转移支付可以显著促进地方政府在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

一般性转移支付又称无条件转移支付,是上级政府为均衡下级政府财力而进行的财政拨款。尽管目前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分为均衡性转移支付等7大类,但从使用上来看都是由地方政府进行分配。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而根据目前已有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受到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是所谓的“晋升锦标赛”。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造就了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8]。但是在这种体制下地方财政支出往往更加倾向于建设性项目以及政府消费性项目。如傅勇(2008)的研究发现,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并不是平衡导向的,而是财政激励性的^[19];郭庆旺、贾俊雪(2008)在研究中分析了在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公共交通三个领域中转移支付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于基础教育的影响不显著且扩大了公共交通领域的差距,不过研究中没有对分省专项转移支付数据使得结果缺乏针对性^[20]。因此,根据“晋升锦标赛”假说,直接补贴地方财力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则有可能会加剧地方财政支出的扭曲^[17]。

第二个因素是我国地方政府进行预算编制时较为依赖增量预算方式。付文林(2012)的研究表明,我国地方财政预算体制具有明显的增量预算特征,本期财政支出与上期高度相关^[21]。在这种情况下,当原有的财政支出结构偏离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时,增加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并不一定能被合理分配于公共服务支出。

第三个因素是“粘蝇纸效应”的存在。付文林(2012)等人的研究已经证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粘蝇纸效应^[21]。Stein(1997)的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可能会导致政府的支出行为被扭曲,更加偏向于行政性支出^[22]。尹恒、朱虹(201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经济建设,而不是公共服务^[23]。

由于专项转移支付通过各个领域的专项资金作

用于公共服务支出中,而一般性转移支付则是由地方政府统一安排,因此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不能够进行整体对比,而是取决于各个领域的特性。一般地,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领域则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近年来随着绿色GDP概念的深入人心,地方政府对于环保投入也越来越重视。因此本文推测,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领域,专项转移支付相应分项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促进作用高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而在环境保护和公共交通领域等领域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促进作用则不一定高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相对于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领域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作用不显著。

三、专项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择

陈昌盛(2008)和陈海威(2007)等人通过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与基本公共服务范围、财政能力、基础条件及成本差异、人口、组织框架和管理水平等因素相关^[24-25]。本文将专项转移支付的因素添加到他们的模型当中,并将模型的因变量由公共服务水平修正为公共服务支出,因为专项转移支付往往由当地公共服务水平决定,公共服务落后地区往往会获得更多专项转移支付,因此专项转移支付是公共服务水平的结果而非原因。在修正后的模型中,公共服务支出可以表达为:

公共服务支出= F (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能力,基础条件与成本差异,地方政府行为,人口,随机因素)。

根据上述表达式,本文选取相关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地方公共服务支出。根据曾红颖(2012)等人研究^[26],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由9大领域构成,分别是: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环境保护、城乡社区建设、交通运输、文体传媒。而在这9大领域中,专项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对比见表2所列(以2017年为例),从中可以看到,在公共管理等领域专项转移支付的重要程度很低可以忽略。同时,公共安全、公共管理与文体传媒领域对于民生的直接影响也相对较小。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选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与环境保护、交通运输五大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专项转移支付对

于地方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并与一般性转移支付进行对比。由于各个省份人口差距较大,这里采用人均公共服务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

表2 2017年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与对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对比

公共服务类别	2017年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亿元)	2017年地方公共服务支出(亿元)	专项转移支付占地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
1. 公共管理		15 238.90	
2. 公共安全	41.25	9 466.40	0.4
3. 教育	1 484.57	27 893.59	5.3
4. 医疗卫生	1 046.87	13 906.97	7.5
5. 社会保障和就业	2 659.27	21 529.43	12.4
6. 环境保护	1 661.65	4 469.62	37.2
7. 城乡社区		19 191.17	
8. 交通运输	3 318.49	9 211.29	36.0
9. 文化传媒	218.19	2 919.28	7.5

注:源自财政部预算司2017年决算数据。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与被解释变量一样,选取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与就业、节能与环境保护、交通等五个领域,且采用人均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作为解释变量。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搜集了2011-2016年省级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分项数据。

3. 控制变量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地方财政能力、基础条件与成本差异、地方政府行为以及人口。为便于定量研究,本文为每种变量选取了可以量化的度量指标:

(1)地方财政能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是模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采用地方财力来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2)基础设施条件与成本差异。经济发展程度与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度量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与成本差异,本文采用人均GDP与路网密度来衡量这一因素。

(3)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行为偏好难以使用定量方式度量,尽管一些研究中将财政自给率作为度量指标,但是曾明(2014)等人的研究显示财政自给率和地方政府行为不相关^[27],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中财政自给率也和研究结果不相关,因此,本研究采用财政供给人口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来表征地方政府行为。

(4)人口。本文采用地区年末总人口作为度量指标。考虑到模型中各个变量类型和量级上的差距较大,研究变量之间的弹性关系可能会更好地分析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对模型中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根据以上定义和处理方法,文中各指标的计算方法和变量符号见表3所列。

表3 研究变量含义

变量名称	度量指标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地方人均教育支出	EXP_EDU	LOG(地方教育支出/年末总人口)
	地方人均社保支出	EXP_SS	LOG(地方社保支出/年末总人口)
	地方人均医疗支出	EXP_MED	LOG(地方教育支出/年末总人口)
	地方人均环保支出	EXP_EP	LOG(地方教育支出/年末总人口)
	地方人均交通支出	EXP_TR	LOG(地方教育支出/年末总人口)
解释变量	一般性转移支付	GTR	LOG(一般性转移支付/年末总人口)
	人均教育专项转移支付	STR_EDU	LOG(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年末总人口)
	人均社保专项转移支付	STR_SS	LOG(社保专项转移支付/年末总人口)
	人均医疗专项转移支付	STR_MED	LOG(医疗专项转移支付/年末总人口)
	人均环保专项转移支付	STR_EP	LOG(环保专项转移支付/年末总人口)
	人均交通专项转移支付	STR_TR	LOG(交通专项转移支付/年末总人口)
控制变量	人均GDP	GDP	LOG(GDP/年末总人口)
	公路密度	HD	LOG(公路里程/辖区面积)
	地方自有财力	LFR	LOG((地方本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年末总人口)
	财政人口比重	FSP	LOG(财政人口/年末总人口)
	城镇人口比重	UR	LOG(城镇人口/年末总人口)
	人口	POP	LOG(年末总人口)

注: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财政部相关数据。

(二)模型构建

李斌(2015)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属性,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28]。根据直观推断,本研究所需的各变量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因而需要在建模时予以充分考虑。为了确定本文变量间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笔者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了Moran's I指数检测。Moran's I定义如下:

$$\text{Moran's } I = \frac{\sum_i \sum_j W_{ij} (Y_i - \bar{Y})(Y_j - \bar{Y})}{S^2 \sum_i \sum_j W_{ij}}$$

当Moran's I指数处在[0,1]区间内时,说明指标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为0时,说明不存在空间相关性,指数处在[0,-1]区间内时,则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地区邻接矩阵作为空间矩阵,并以此进行了计算。表4列出了主要指标的Moran's I指数,结果表明主要指标的Moran's I指数值显著为正,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

在对模型中所有变量进行Moran's I指数检验后发现,绝大部分变量的Moran's I指数在5%水平上显著,其余变量也在10%水平上显著。因此,如果采用普通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研究,结果会产生偏差。为了克服变量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并考虑各省份之间的差异,模型采用空间固定效应进行计算。

表4 模型中变量各年度Moran's I/指数

变量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GDP	0.435	0.423	0.412	0.396	0.412	0.396
FSF	0.394	0.387	0.391	0.391	0.391	0.391
POP	0.241 [*]	0.243 [*]	0.217 [*]	0.194 [*]	0.217 [*]	0.194 [*]
FSP	0.608	0.614	0.623	0.614	0.623	0.614
HD	0.154	0.157	0.165	0.159	0.165	0.159
LFR	0.291	0.292	0.283	0.292	0.283	0.292
EXP_SS	0.193	0.182	0.234	0.241	0.234	0.241
STR_SS	0.335	0.166	0.417	0.421	0.417	0.421
EXP_EDU	0.271	0.262	0.246	0.241	0.246	0.241
STR_EDU	0.383	0.392	0.305	0.268	0.305	0.268
EXP_MED	0.180	0.181	0.186	0.179	0.186	0.179
STR_MED	0.383	0.392	0.305	0.268	0.305	0.268
EXP_CI	0.195	0.174	0.154	0.159	0.154	0.159
STR_CI	0.263	0.265	0.358	0.248	0.358	0.248
EXP_TR	0.221	0.308	0.132 [*]	0.067 [*]	0.132 [*]	0.067 [*]
STR_TR	0.286	0.307	0.409	0.304	0.358	0.248

注:*表示参数在10%显著水平上显著,未进行标注的参数均在5%或更高显著水平上显著。

设空间杜宾模型结构如下:

$$EXP_{i,t} = \rho W_{i,t} + X_{i,t} + WX_{i,t} + \varepsilon_{i,t}$$

$$X = \alpha_1 GDP + \alpha_2 UR + \alpha_3 POP + \alpha_4 FSP + \alpha_5 HD + \alpha_6 LFR + \alpha_7 STR$$

式中, W 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相邻地区权重为1,否则为0; EXP 为地方人均公共服务支出; X 为自变量向量,由一系列自变量构成,其中GDP为地区国民生产总值, UR 为城镇化率, POP 为年末总人口, FSP 为财政供养人口比例, HD 为路网密度, LFR 为人均地区财力, STR 为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分项金额; α 为相应系数; i,t 代表第*i*年省份的数据; ε 代表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所列。

表5 模型中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GDP	11.65	9.71	10.69	0.42
UR	-0.11	-1.48	-0.63	0.25
POP	9.31	5.71	8.12	0.84
FSP	-3.00	-4.91	-4.42	0.32
HD	9.97	6.24	8.82	0.88
LFR	10.18	7.55	8.54	0.54
GTR	10.20	5.02	7.52	1.05
EXP_EDU	8.55	6.71	7.45	0.35
STR_EDU	7.28	2.51	4.63	0.89
EXP_MED	7.66	5.92	6.61	0.36
STR_MED	7.18	2.51	4.55	0.86
EXP_SS	8.75	6.21	7.12	0.48
STR_SS	8.05	3.42	5.35	0.99
EXP_ENV	7.47	4.58	5.66	0.56
STR_ENV	7.46	-5.03	3.51	3.54
EXP_TR	8.76	4.40	6.60	0.58
STR_TR	8.20	3.93	5.60	0.80

2. 回归结果

根据上述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本文对教育、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与交通五大领域中转移支付的影响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见表6所列。

表6 实证研究计算结果

变量	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	交通运输
GDP	0.103 0 (0.71)	0.307 6*** (2.96)	-0.107 7 (-0.59)	0.497 3 [*] (1.72)	1.066 2** (2.43)
UR	0.994 7*** (3.25)	-0.027 6 (-0.13)	-0.166 0 (-0.43)	0.037 2 (0.06)	-2.257 8** (-2.51)
POP	-0.408 5 (-0.63)	0.643 2 (1.39)	0.405 8 (0.50)	-3.827 5*** (-2.86)	0.823 1 (0.41)
FSP	0.514 2*** (3.53)	-0.250 5** (-2.38)	0.580 6*** (3.18)	0.346 8 (1.15)	-0.127 6 (-0.29)
HD	-0.592 3*** (-2.99)	-0.023 9 (-0.17)	0.193 5 (0.77)	-0.924 1** (-2.31)	0.671 3 (1.11)
LFR	0.267 8*** (3.99)	0.197 1*** (4.09)	0.138 7 (1.62)	0.316 9** (2.37)	0.359 7 (1.77)
GTR	0.037 6 [*] (1.91)	-0.005 4 (-0.38)	-0.018 0 (-0.71)	0.184 0*** (3.96)	0.478 4*** (6.79)
STR	0.396 5*** (4.44)	0.315 5*** (4.89)	0.547 9*** (4.94)	0.388 9** (2.19)	0.678 1** (2.52)
$W \times GDP$	-0.488 6 [*] (-1.71)	0.108 8 (0.52)	0.859 1** (2.23)	-1.114 8 [*] (-1.96)	0.785 8 (0.85)
$W \times UR$	0.434 7 (0.71)	0.610 6 (1.37)	0.214 4 (0.27)	1.076 1 (0.88)	-1.320 8 (-0.70)
$W \times POP$	3.104 7** (2.70)	-1.626 2 [*] (-1.98)	1.318 7 (0.92)	16.070 5*** (6.87)	1.178 3 (0.33)
$W \times FSP$	-0.011 4 (-0.04)	-0.246 6 (-1.15)	-0.997 0 [*] (-2.61)	0.228 2 (0.38)	0.0757 (0.08)
$W \times HD$	-2.008 4*** (-3.92)	0.311 4 (0.87)	0.204 3 (0.30)	-4.370 7*** (-4.21)	0.176 0 (0.11)
$W \times LFR$	0.010 5 (0.09)	-0.299 1*** (-3.60)	-0.511 4*** (-3.34)	0.094 3 (0.40)	-0.533 6 (-1.46)
$W \times GTR$	0.183 7 (1.58)	-0.065 2 (-0.80)	-0.039 3 (-0.27)	0.477 4** (2.29)	-0.644 7 [*] (-2.10)
$W \times STR$	-0.088 1*** (-3.15)	0.055 0** (2.50)	0.015 8 (0.59)	-0.184 2*** (-3.94)	-0.195 8 [*] (-1.82)
$W \times EXP$	0.369 0*** (4.51)	0.587 0*** (9.13)	0.193 9** (2.08)	0.308 0*** (3.60)	0.051 0 (0.51)
Adj- R^2	0.900 1	0.968 3	0.921 1	0.793 2	0.532 6
log-likelihood	283.68	-340.04	243.55	155.81	80.01

注:括号中数字为*t*值;***、**、*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3. 结果分析

对于五大公共服务领域,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高,说明模型得到了较好的拟合。进一步分析可知,在不同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1)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置信度较高的本地变量包括城镇人口比重、财政供养人口、地方财政收入、路网密度、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其中教育领域专项转移支付的系数为正,说明具有专款专用性质的专项转移支付可以有效促进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这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一般性专项转移支付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相对于专项转移支付,其对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为负或不存在,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其他变量方面,地方财政收入和城镇人口比重的系数为正,可以解释为

地区发展程度越高越愿意进行教育支出;财政供养人口的系数为正,表明一个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口比重越高则教育领域的投入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教师也属于财政供养人口;路网密度系数为负说明交通设施和教育支出成反比,这可能是因为交通条件较差的区域教育服务成本较高,需要更多的投入。

置信度较高的空间相关项包括路网密度、教育支出以及专项转移支付的空间相关项。路网密度空间相关项系数与本地系数同样为负,考虑路网显然具有地域相关性,这是可以理解的;教育支出和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空间相关项系数为正,说明相邻省份和本省的教育支出与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具有正向的地域相关性,也符合直观感受。

(2)医疗卫生领域。在医疗卫生领域,置信度较高的本地变量只有地方财政收入和医疗专项转移支付。其中,医疗领域专项转移支付系数为正,说明其可以有效促进医疗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一般性专项转移支付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相对于专项转移支付,其对医疗支出的促进作用为负或不存在,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此外地方财政收入的系数为正,说明地方财政收入越高则医疗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越高。

置信度较高的空间相关项包括GDP、地方财政收入以及社保支出的空间相关项。GDP和地方财政收入的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富裕地区的医疗支出普遍较高,反之亦然;社保支出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推测是因为地区富裕程度和社保体系可能存在正向关系。

(3)社会保障领域。在社会保障领域,置信度较高的本地变量包括财政人口比例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社会保障领域专项转移支付系数为正,说明其可以有效促进本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证明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一般性专项转移支付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相对于专项转移支付,其对社保支出的促进作用为负或不存在,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此外财政供养人口比例的系数为正,这可能是因为财政人口享受的社会保障较为完善,财政人口较高则社保支出也会提高。

置信度较高的空间相关项包括GDP、社保支出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的空间相关项。GDP和医疗支出的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富裕地区的社保支出普遍较高,反之亦然;而地方财政收入的反向空间相关性则令人费解,有待进一步研究。

(4)环境保护领域。在节能环保领域,置信度较高的本地变量包括GDP、总人口、路网密度、地方财政收入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其中,专项转移支付的系数为正,说明其对于环保领域

的公共服务支出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证实了假设1;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系数也显著为正,一般项转移支付也对环保支出有正向促进作用,没有违反假设2,说明随着我国绿色发展理念被更为广泛地接受,地方政府对于“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观点越来越认同。其他变量中,GDP、地方财力的系数为正,说明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正相关,符合直观感受。人口和路网密度的系数为负,说明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均环保投入相对较低。

置信度较高的空间相关项包括GDP、人口、路网密度两类转移支付以及环保支出的空间相关项。其中GDP、专项转移支付和路网密度系数为负,这可能说明周围省份越发达且对于环保的投入越多,则本省环境的外部情况就越好,外省污染的溢出效应较小,因此可以减少环保投入。而人口、一般性转移支付系数为正,代表外省人口越多则污染的溢出效应越强,本省必须加强环保投入。

(5)交通运输领域。在交通运输领域,置信度高的本地变量包括GDP、城镇化率、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其中,交通运输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系数为正,说明其对于本领域公共服务支出具有促进作用,证实了假设1;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一般项转移支付对环保支出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没有违反假设2。其他变量方面,GDP和城镇化率的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发达、城镇化率高的地区交通运输支出更高,符合直观感受。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而增强结论的说服力,本文采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人均GDP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表7显示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核心变量的系数以及显著性没有明显的改变,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研究结论依旧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7 实证研究计算结果

变量	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	交通运输
GDP	-0.000 1 (0.00)	-0.168 1 (-0.44)	-0.373 7 (-0.57)	0.497 3 [*] (1.72)	1.819 9 (1.09)
UR	0.977 5 ^{***} (2.98)	0.219 2 (0.93)	0.007 4 (0.02)	0.037 2 (0.06)	-2.051 2 ^{**} (-2.09)
POP	-0.341 1 (-0.52)	0.188 2 (0.41)	0.084 9 (0.11)	-3.827 5 ^{***} (-2.86)	0.262 1 (0.13)
FSP	0.532 4 ^{***} (3.41)	-0.136 3 (-1.21)	0.566 9 ^{***} (2.89)	0.346 8 (1.15)	-0.003 8 (-0.01)
HD	-0.530 5 ^{***} (-2.72)	-0.135 9 (-0.98)	0.054 0 (0.23)	-0.924 1 ^{**} (-2.31)	0.330 0 (0.54)
LFR	0.294 0 ^{***} (4.75)	0.253 8 ^{***} (5.70)	0.100 7 (1.28)	0.316 9 ^{**} (2.37)	0.621 6 ^{***} (3.28)
GTR	0.042 2 ^{**} (2.14)	-0.003 5 (-0.25)	-0.011 2 (-0.44)	0.184 0 ^{***} (3.96)	0.461 7 ^{***} (6.39)
STR	0.436 9 ^{***} (4.53)	0.224 3 ^{***} (3.29)	0.414 5 ^{***} (3.46)	0.388 9 ^{**} (2.19)	0.797 5 ^{***} (2.71)

续表7

变量	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	交通运输
$W \times GDP$	-0.495 1 (-0.86)	0.937 9** (2.25)	1.712 9** (2.31)	-1.114 8* (-1.96)	-2.104 7 (-1.17)
$W \times UR$	0.334 7 (0.57)	0.323 5 (0.78)	0.215 9 (0.30)	1.076 1 (0.88)	1.196 9 (0.68)
$W \times POP$	3.356 0*** (2.81)	-0.994 5 (-1.17)	1.217 8 (0.83)	16.070 5*** (6.87)	1.515 0 (0.40)
$W \times FSP$	-0.028 5 (-0.09)	-0.332 7 (-1.52)	-1.150 2*** (-3.01)	0.228 2 (0.38)	0.284 5 (0.31)
$W \times HD$	-1.611 7*** (-3.13)	-0.344 7 (-0.95)	-0.747 7 (-1.18)	-4.370 7*** (-4.21)	-0.575 0 (-0.36)
$W \times LFR$	-0.068 7 (-0.73)	-0.326 5*** (-5.31)	-0.392 5*** (-3.70)	0.094 3 (0.40)	-0.129 6 (-0.48)
$W \times GTR$	0.256 1* (1.91)	-0.155 2* (-1.84)	-0.232 1 (-1.45)	0.477 4** (2.29)	-0.258 6 (-0.71)
$W \times STR$	-0.087 5*** (-3.13)	0.042 7* (1.96)	0.014 8 (0.56)	-0.184 2*** (-3.94)	-0.245 4** (-2.30)
$W \times EXP$	0.345 0*** (4.09)	0.563 0*** (8.34)	0.130 0 (1.35)	0.308 0*** (3.60)	0.071 0 (0.71)
Adj- R^2	0.900 7	0.968 2	0.924 3	0.793 2	0.505 8
log-likelihood	283.58	-340.90	247.03	155.81	75.05

注:括号中数字为t值;***、**、*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四、研究结论

(1)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就业与社会保障、节能与环保、交通运输五大领域,地方公共服务支出的专项转移支付弹性都较高,说明专项转移支付能够有效促进地方公共服务支出。

(2)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在节能环保和交通运输领域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公共服务支出有正向促进效果,效果可能弱于专项转移支付,但是更加显著。

(3)以上结果证明我国地方政府不倾向于将自有财力分配于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就业与社会保障领域,而专项转移支付能够起到矫正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扭曲的作用。

(4)研究结果显示,在节能环保领域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公共支出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已经被地方政府所接受。

本文认为,上述结论可以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带来一定的启示,即可以使用调节转移支付结构的方法来调控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只有根据各地区财政和公共服务状况因地制宜地调整两类转移支付的比重,才能保证转移支付资金的效用最大化。

参考文献:

- [1]朱承亮.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与来源分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6):36-54.
- [2]刘志杰.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时空演变: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J].统计与决策,2011(2):103-105.
- [3]刘溶沧,焦国华.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与转移支付制度创

新[J].财贸经济,2002(6):5-12.

- [4]刘凤伟.财政转移支付与缩小地区差距[J].管理观察,2008,21(13):27-29.
- [5]周亚雄.基础设施、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的关系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3.
- [6]胡德仁,刘亮.中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我们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多远[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29(4):27-30.
- [7]姜永华,文少兵.分税制改革新路向[J].中国报道,2008(2):72-75.
- [8]姜永华,鲍曙光.论民生财政[J].财政研究,2014(6):18-21.
- [9]MCGUIRE M C. The analysis of federal grants into price and income components fiscal federalism and grants in aid [M].Washington, D C: The Urban Institute, 1979.
- [10]ISLAM M. Fungibility of matching conditional grants to local government[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998, 77(4):361-373.
- [11]董再平.论我国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模式的选择[J].税务与经济,2013(5):19-23.
- [12]李丽琴,陈少晖.专项转移支付存在的合理性:政治逻辑与实证检验[J].当代财经,2012(10):44-52.
- [13]赵海利.经济发达地区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受益归宿分析——以东部某省为例[J].教育研究,2014(7):75-83.
- [14]马光荣,郭庆旺,刘畅.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16(9):105-125.
- [15]李萍.财政体制简明图解[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 [16]BESFAMILLE M. Local public works and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1):353-375.
- [17]尹振东,汤玉刚.专项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行为——以农村义务教育补助为例[J].经济研究,2016(4):47-59.
- [1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19]傅勇.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2008(11):16-25.
- [20]郭庆旺,贾俊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J].世界经济,2008(9):74-84.
- [21]付文林,沈坤荣.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J].经济研究,2012(5):45-57.
- [22]STEIN 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ize in Latin America[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1999, 62(1):63-69.
- [23]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1):88-101.
- [24]陈海威.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 2007(3):98-100.
- [25]陈昌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行动路线图[J].财会研究,2008(2):15-16.
- [26]曾红颖.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体系及转移支付效果评价[J].经济研究,2012(6):20-32.
- [27]曾明,华磊,刘耀彬.地方财政自给与转移支付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门槛分析[J].财贸研究,2014(3):82-91.
- [28]李斌,李拓,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财政支出与城市化——基于中国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5(6):79-90.

[责任编辑:欧世平]